

# 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地理学：过去的 教训和改革的道路\*

A. Γ. 伊萨钦科

在我国实施改革已近五周年，是应对它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地理学不可能，也不应当徘徊在改革进程之外。但是如果从近年来地理刊物的评论看，似乎地理学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多大的必要进行改革。地理学会的活动也不见有什么改革措施。诚然，在1988年底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中的一项就是所谓的以《地理学与改革》为题的“圆桌会议”。这一措施纯粹是为了“应付”。但很快在同年的11月22日地理学会的学术委员会开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地理学与改革》，会上谈论了很多：国家经济的失算，计划不周，生态危机，抱怨对地理学不公正的不承认态度，抱怨领导干部在地理知识上是文盲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一般说来还算是正确的。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地理学家的责任，地理学本身的失算等问题则谁也无暇去搞清楚。如果得出这种现象：我们地理学家都是好的，不知为什么别人不尊重我们。最后学术委员会也没形成任何决议。

然而地理学的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一个客观的现实是，近几十年来地理学在退化。可以列举很多例证。我比较容易以列宁格勒的地理学为例来说明问题。50年前我踏入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门，在那里工作了近40年，与地理学会也保持了近40年的联系，有足够的资料用于比较和思考。无须多加说明，列宁格勒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很多年一直是俄罗斯地理学的中心，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理高等学府（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而且几乎所有苏联的地理院士学习和学术活动的某个阶段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渡过的。我赶上了列宁格勒大学《黄金时代》的末期，那时几乎每个教研组都有全苏性，甚至有世界意义的学派。而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教授人数减少了一倍，1989年初，有些教研组已无领导人，教研组成员锐减，只有个别教研组有4~5个以上的教授。我不想比较教学水平，我担心这种比较对今天的地理系不利。

我国两个主要地理学术刊物《全苏地理学会学报》和《苏联科学院学报·地理卷》发行份数的变化可作为一般性的象征性指标。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杂志的发行份数同步地下降。在卫国战争前夕，1941年上半年《全国地理学会学报》的订数创最高记录——5000份。在战争期间订数自然下降以后又重新回升，1947年达4000份，以后又开始下降，但在1956年以前仍维持在3000份以上，然后又开始迅速下降，近年来杂志的发行份数维持在战争封锁时期的水平，约1600份。还要指出，杂志变得越来越薄。

过去时期的社会政治条件不可能不影响到整个苏联科学，包括地理学的发展。在我的记忆中有《列宁格勒事件》，击溃以A. A. 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列宁格勒大学事件，可悲的1948年著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及对生物学家的中伤，与《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斗争等

\* 这是作者为迎接全苏第九次地理学会代表大会的文章，目的在引起对苏联地理学改革道路的讨论，从中可见苏联地理界的部分思想动态——译者。

等，杰出的地理学家Я. С. 埃德尔施泰因死于斯大林时代的刑讯室中，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主任В. М. 施泰因遭到镇压，我再举一例说明那个时代的情况。一本已装订成册，印数为5000份的有关自然地理主要问题的书，因发现其中没有必须的赞扬伟大导师和领袖天才著作的内容，由作者本人用手工撕下每本书的前言，换上新的前言，用胶水粘上去。这位作者总算幸免大祸，一般的后果比这要危险得多。

但是出现了《气候转暖》，老年人和中年一代都清楚记得，曾经有过多少针对学者的讽刺和小品，他们中有多少人被指责为《脱离生活》。Т. Д. 李森科继续得势，对生物遗传学家的迫害没有停止。从这时期开始把学科分为两级，研究所按工资和假期长短的相应差异分类排列。到目前为止一类研究所的博士享受48天假期，而二类研究所的同行们承担同样的工作（可能更为重要或繁重的工作），其享受的假期要比他们短一半。从这时起，即从1964年起开始对所有的事都保密并歪曲事实。在改组的尘雾中取消了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尽管许诺共产主义已临近，但以上所说一切无法使地理学家感到鼓舞。

在最近的《停滞》时期对待科学的消极趋势亦在加深，并且又出现了新的不良倾向。我认为首先是表现在干部政策上，在学术界建立了特权等级，吸引科研人员不是按才能，而是按履历表。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没有枪毙，但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从送《精神病院》到取消公民权。现在我们可公开承认人才外流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正常的科学活动形式被扭曲。如对待选举院士的态度和不正常的奖励制度（包括国家奖金在内）。投考研究生的自由竞争时代早已过去，现在它是有针对性的，根据各个部的通知单投考研究生，这就为一些对科学陌生但有好的履历表并与地方名流有密切关系的人开了绿灯。此外学术界还沾染了诸如贪污受贿，虚有其表，任人唯亲，小集团主义等社会通病。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多么严重地混杂了一些具有追求个人名利，不学无术，欺骗公众等不良习气的人。

行政领导体制加上部门壁垒和本位主义束缚了科学界的手脚。不久前取消了苏联高教部，建立了国家教委，但却保留了俄罗斯联邦高教部。不明白，是谁需要这个部？为什么莫斯科大学、卡赞大学隶属全苏部级，而列宁格勒大学、萨拉托夫大学却属共和国级？看样子是需要给相应的官员进贡点什么。行政领导习气使学术界滋生了贪大的嗜好，这种作风与科学研究工作是对立的。大量资金消耗在谁也不需要的庞大的科学计划上，它们经常是受命《论证》，准确地讲是证实已预先决定的某些《重大建设方案》的正确性。把科学成就引用到实际中去遭到官僚主义者的阻挠。科研系统，特别是高等学校物质技术装备的贫乏已成为大家谈笑的话柄。

一些图件和统计资料的保密和被歪曲对地理学有很大影响。地理学损失了不少有才能的学者，造成以上不幸的原因当然要在那一段不正常的斯大林停滞时期去找。但是为什么在最沉重的30—40年代也是地理学的繁荣期呢？这个答案要从知识分子内部去找。沉重的气氛并没有摧毁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科学的大气候造就了一批正直的，有原则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为科学事业效力，为人民服务。不管是在领袖的光辉日子，还是在20次党代会被揭露以后，对他们都无重大影响。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精神上走向堕落。

我们地理学家不能硬说近几十年来地理学所处的条件比其他学科差。正好相反，应当承认客观现实，在镇反时期我们受的损失比生物学家小。没有受到生物遗传学家和动力学家们那样的迫害。因为幸运的是，地理界没有李森科。更何况地理学虽然有很大的潜力，在生态

和资源危机时代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和责任，它仍处于科学的尾端。

地理学不景气的一个内部原因是它缺乏学科带头人，缺乏拥有崇高威望，清醒地认识地理学发展道路，有组织能力，能建立学派的学者。

地理学在各学科领域内是专业学者最少的学科。地理学家人数虽少，但内部还不团结。彼此间不是开展合作，而是竞争，部分专家之间，学派之间发生大大小小的内哄，一部分人力图垄断地理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思想。例如，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两派力量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竭力造成Л.С.贝尔格（莫斯科大学一方）与А.А.格里戈里耶夫（地理所一方）的对立。还有，大家都知道，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垄断了开展景观研究国际合作的一切活动。整个学术集体的命运和科学新方向的发展取决于个别人的兴趣。在列宁格勒建立科学院地理所分部的计划受到阻挠，给地理学这一重大中心以不可挽回的打击。

我们现在十分关心培养接班人，培养高级人才。但我们的学术委员会降低了对报考学位者的要求，在学术委员会上经常有一些外行的专家。不是按该学术委员会的专长主持论文答辩，有些学术委员会成批地进行论文答辩，对本国的答辩者和友好国家的答辩者采取迁就的态度。特别是一些友好国家的一些不愿意为本国服务不相信苏联科学的人也通过了答辩。

很多地理学家看不到科学研究长远性和暂时性的差别，大大削减了基础研究的比重，对野外工作和试验工作不再感兴趣。由于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是发表论著的多少，专业书刊上充斥了一些空洞无味的文章，打击了一些严肃的地理工作者向地理刊物投稿的积极性。这就必然削弱了地理刊物的专业特性。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改革已进行了五年，还没看到地理学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有时改革只表现在招牌的更换上。不久前列宁格勒大学地理系易名为地理与地生态系，这种更改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根据的。第一，这一名称变更的倡导者们谁也不能说明，什么是地生态学。第二，地生态学按其规模而言任何时都不能与地理学相提并论，它最多只是地理学的一部分，用“与”这一连接词把它与地理学并列是不恰当的，这种称法就象我们讲《地理与景观系》，《生物和动物系》一样。第三，我还没见到地理系有一位专家扪心自称是地生态学家。第四，地理系还没有一个教研组把自己的牌子换成是《地生态教研组》。最后，第五，地理系没进行任何地生态专业教育，毕业生中还没有人称自己是地生态学家。现在教学计划的变更显得更加糟糕，例如普通地理课程变成一些彼此割裂的部门学科的组合，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苏联地理学会中也存在消极，不景气的现象。不能说这个社会组织富有公开性和民主精神。领导机构的选举只是走形式，没有选择余地，其结果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对我来讲，推选地理学会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机制仍然是个谜。

目前的趋势是很多重要的社会职务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个别的人和集团力图垄断真理，垄断地理学目的和任务的解释权。习惯的，不民主的做法是，预定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的报告、杂志和文集里的文章使一些活动家们的同一语言可以报告多次，把他们强加给地理界，同时把年青的“不知名的”学者排斥在外，阻碍他们成长。地理学会是推动国际交流的组织，但能出国的不是专家学者，而是学会的领导层。

所以，地理学需不需要改革？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然而，毫无疑问，并不是每个人都关心改革。不过，在我们地理学家没有改变自己以前，很难要求别人承认我们，尊重我们。当然，改革的很多方面取决于外部条件，取决于全国科学界组织上的改革，财政的改善和物质技术装备的改善等。

到目前为止，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似乎还没有充分评价基础学科的作用。表现在几乎整个科学界都将要转为经济核算制，现在正在谈论所有专业学术杂志都要转为自负盈亏并取消《不营利》的杂志的说法，要知道它们在营利方面是无法与诸如《女工》、《火花》等杂志竞争的，但是没有这些专业学术杂志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现代的文明国家。

我们同意B. E. 帕通院士的意见：“进一步使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活动都转为经济核算制就会扼杀它们的基础——基础研究”。另外，B. B. 劳申巴赫院士的以下一段话与前者相呼应：“在基础科学上节约是愚蠢的，吝啬的人将要加倍付出，此外，他还必须为成为进步的尾巴而付出”。

盲目追求大规模的趋势和把农业集体化的方法搬到组织科学研究中的做法给科学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在这里再援引B. B. 劳申巴赫的一段话：“世界经验说明，杰出的发明产生于能自由创造，有知名学者领导（而不是知名行政干部的领导）的小型学术集体中的”。B. B. 劳申巴赫认为，基础科学的主要组织形式不应是妄图实行垄断的主要的大科研所，而是由内行的学者领导的具有竞争力的学派，他们可形成试验室并应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

反对小课题的斗争是由上而下培植的科学中准集体主义的实例。教研室的成员根据各自的兴趣拟定个人研究课题是不允许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为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在一个教研组内需要有不同专业的各种专家。譬如自然地理教研组，有人从事科学史研究，有人研究高加索或北极，有人是古地理学家等等。这样每个人就可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有效地工作。但事情并不是这样。所有的人都自上而下组织到一个“重要”课题中，这个课题不仅把一个教研室的成员，甚至把整个系，乃至几十个科研单位的人联合成一个集体。在这个庞然大物似的课题中协调研究工作实际上不可能。在系里1—2个人被工作缠绕，其他人只能充数，形式上参加。这样必然是造成无人负责现象，一部分人负担过重，另一部分人没有责任感，彼此间不满、抱怨。这样组织科研工作的效果必然很低。虽然《主动提出的》科研课题常常是出现新思想的源泉（这些新思想甚至可用于研究《重要》和《集体》课题中），但它仍多方受到歧视。

然而这里又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否已准备好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脱离行政领导干预和部门监督？反对改革的因素已在学术界深深扎根，学术界改革的过程，民主化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

地理学改革的一个主要条件是明确认识它的确切任务，首先是基础研究的意义和内容。众所周知，地理学与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在解决当代这些重大问题中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呢？在近来的多次发言中地理学家们自豪地称自己在关闭沿湖纸浆厂中立了功。但是我们的专业职能是否就表现在这里？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其他城市没有地理学家的任何帮助也照样关闭了一些工厂。现在社会各界又在积极争取关闭原子能电站，拆毁列宁格勒防洪坝等等。地理学家应不应该总是无条件地去支持这种自发运动？说关闭、禁止、拆毁是很容易的。这种不加选择又不经科学论证的行为有点象卢达主义（指十九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的手段来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译者注）。

我国萌发出的民主精神的权威性还远远不够，它本来也应扩及到学术界去。科学地解决上述问题在于寻求二者统一的方案。学者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是他们能预测这种或那种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预测的能力是任何科学成熟性的主要标志。众所周知，人们曾经多么热烈地谈论到跨流域调水问题。通过一些非专业人员的积极活动《调水》一词几乎成了骂人的，被禁止的词汇。但是能不能认为，调水问题已经彻底地、无可挽回地被取消了，就像一些积极分子援引党和政府的文件所描绘的那样？事实上这些文件上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个文件是

苏共第27次党代会的决议，那里有唯一的、但是很有份量的一句话：“深入研究区域性调水问题”。能不能把深入研究一词解释为彻底取消？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有一决议提到“由于要补充研究有关调水的生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最好是停止调水设计和其他的工作。下面又讲：“已委派国家科委、苏联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在全面的生态和经济研究，运用现代经济-数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和深入分析国内外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区域调水问题”。

最后，不久前1988年1月1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改善国家水资源利用的首要措施”决议中明确指出：“苏联国家科委、苏联科学院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吸收有关的部委，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在全面进行经济和生态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区域调水问题，于1988年3月1日前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进行上述工作的计划”。

可见，决议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开展对调水问题的科学研究，完全不是《停办》（这里不是直接对地理学家讲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有理由不参加这个问题的研究）。企图把党和政府的决议解释为否定调水就会使社会舆论界迷失方向，给学术界造成不应有的压力。问题仍然存在，但党和政府的决议指出了各方面应占有的位置。科学研究应做在决议通过以前。学者没有权力向某一社会集团发泄情绪或施加压力，不管他们是多么“不成熟”。众所周知，一些社会情绪往往掺杂着无知和利己主义者的利益。

至于说调水，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它并没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在这个问题上地理学家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应能预见到各种调水方案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后所能引起的一切可能后果（当然首先是消极后果）。

做好预报的唯一途径是深入认识预报对象。遗憾的是，很多人都忘记了任何学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知识。地理界有不少人经常越过基础研究这一必要阶段，“立即”着手解决应用问题。对任何学科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是很自然的问题，而对地理学却成为不正常的现象。地理学不像其他学科，它不定形，模糊不清。地理学家没有明确的职业特性标准。B. B. 道库恰耶夫曾说地理学在各方面都是模糊不清的，H. H. 巴朗斯基曾说地理学是随便乱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现象当前是更加严重了。很多知名地理学家呼吁弄清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划定地理专业范围的界限却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挥手否定这些呼吁就像挥手驱赶讨厌的苍蝇一样。很多人宁愿恪守以下公式：“地理学是地理学家从事的工作”。

不管我们怎样做出地理学中是一体化趋势占统治地位这一态势，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两个分支学科间深刻脱节这一现实。自然地理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依然各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法论。自然地理学家是按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地理壳及其各个要素的特种时空体系来判断自己的地理属性，而经济地理学家则是从分布概念论证自己的《地理性》，即经济地理的地理性表现在揭示现象的地域变化上。不过世界上实际上没有任何事物和现象没有地域变化，这样就不可能从逻辑上把它们排斥在地理学范围以外。由此地理学便成为“轮廓模糊不清”，“随便乱说”。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经济地理学家断然否认有依赖自然地理学家研究成果的任何成分，这样也就很难说明经济地理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别。

我们异口同声地抱怨对我们评价不够，理解不够。但是在我们还没自己理解自己以前，怎样要求别人理解呢？如果还不尽快在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个分支学科间架起桥梁，我们将有完全崩溃的危险。架起桥梁意味着两者开展实际合作，共同研究，寻求共同的方法论立场。社会经济地理学还不能提出本专业领域内的整体化理论，更谈不上提出整个地理学体系的整体化理论。自然地理有自然地理系统论，它应成为整个地理学体系整体化理论的初始环

# 海岸带的区域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B. C. 邦达连科

当前对海岸带的科学兴趣和实践需要迅速增长，这一课题将成为现代区域科学（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生态学、资源利用经济学等）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课题之一。例如早在1973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联合国秘书处采取相应措施来制定跨学科的海岸带发展和管理纲要。在该理事会第55次全会1802号决议中指出：“海岸带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珍贵的财富之一，而管理和合理利用海岸带是国家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往的15年中，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海岸带的区域管理问题。每一个管理体系反映了国内形成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和沿岸及海洋经济综合体在

节。这一点从现有的经验中已得到证实。自然综合体是整个地理学基础的基础，它是人类生活环境，是生产所需资源的源泉，也是作用、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客体。自然综合体，即地理系统地理应成为地理教育的基础，成为培养地理学各项具体专业人才的基础。

最后，我们现在谈论很多有关地理学生态化问题。每个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地理学很早就“生态化了”，它至少是从斯特拉波开始，那时还没有生态学，而地理学家已开始研究人类的“住所”——人类居住地带（与生态学同一根源，但翻译出的名称不同）。还有卡尔·李特尔关于地球是人类居住场所的理论。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社会生态学理论家，城市生态学家、地生态学家和其他生态学家谁也不记得（还是不知道？）早在100年前B. B. 道库恰耶夫就预见到未来环境会严重恶化，用现在的话讲，是预见了圣彼得堡及其周围地区的生态状况，提出了全面研究自然综合体的详细计划，建立改善“百万”城市人民生活，保证他们身体健康的科学基础。

现在所说的生态一词，与它最初的意义完全不同，最初它只是研究环境对生物影响的生物学科。今天所谈论的《生态》成为片断的科学理论，政治原则，自发的《绿色和平》运动（直到卢德派潮流反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十字军东征），肤浅的推理，轰动一时的报纸新闻等等的混合物。也就是说它很不定型，怎么也放不进科学概念中去。生态学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专家，他们无须通过任何考试，也无须接受鉴定委员会的鉴定。

现代《生态学》要走上严格的科学轨道，就要成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共同研究人在其居住地——地理环境中的行为准则。为此生态学就必须具备科学理论，而这只能是地理理论。地理学拥有巨大的潜力，地理学家们应挖掘这些潜力，使它能服务于社会。

摆在地理学面前有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中学和大学的地理教育，广泛普及地理学取得的成就，恢复原有的地方志传统等等。但本文的任务不是为地理学的改革开“药方”，而是提醒地理学家重视地理学的严峻局面，只有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摆脱这种局面。作者希望，苏联地理学的改革问题能得到苏联地理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们应有的重视。

李德美摘译自《НЗВ. ВГО》，1990，No 2